

鄞州慈善志

《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鄞州慈善志

《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鄞州慈善志 / 《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213-06652-8

I. ①鄞… II. ①鄞… III. ①区(城市)—慈善事业—概况—宁波市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190 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鄞州慈善志

《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福群 陈 春

责任校对

叶 宇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9.75

字 数

91 万

插 页

13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652-8

定 价

1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一：重视纂修地方慈善志书

周秋光

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杜建海先生约我给《鄞州慈善志》写篇序言,科研室主任李锋先生多次联络,并寄来了该书的纸质和电子文本,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让我有了一个学习了解鄞州地方人文历史与慈善文化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浏览,我对《鄞州慈善志》有了两点认识和感受:

其一,该书的内容可谓丰富,且纂修颇具功力。所谓丰富,是该书的时间跨度涵盖了自先秦而历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迄当今上下2400多年的历史,分列古代、近现代和当代3个时段;范围类别包括大事记、地理、史略、机构、人物、义商、项目、风俗、规章、文献10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记述翔实(仅宋以前因史料缺乏较弱),又增添有各种附录。所谓功力,是该书取材涉猎之广和发奋用力之勤跃然纸上;其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10余类共223种;据此而考订辩误,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再加以综合概括、分门别类、分析论证,撰写出洋洋70万言的篇幅;又搜集录入古今图片300多幅。

其二,该书以其比较全面的记述,展示了鄞地自古至今慈善文化的传承及其作用。要之可以概括为如下6个方面:

一是鄞州(古称鄞县)的慈善思想与活动源远流长,绵延相承,越到后来越呈兴盛发展的势头。这里最早的慈善思想与活动信息可以追溯到先秦越王勾践之时,至汉唐逐渐兴起并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到了北宋已呈发展之势。北宋之后经南宋、元、明、清各代而到民国,虽中间有起落兴替、盛衰荣枯,但均得以持续发展而到当代,未曾中辍。其中在两宋、明清、民国,都曾出现过空前高涨、蓬勃兴盛的局面。当代正处在承前启后、创新发展的状态。

二是鄞地的慈善事业呈现出官民共举、相辅并进的历史发展格局。官办慈善首先由先秦时越王勾践开其端,尝称道:“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后历代各朝的鄞地守土官长皆承其绪,各式官办慈善机构先后涌现,至宋代发展到极致。民间慈善最初是宗族慈善,其发轫当比官办慈善为更早,到宋代也发展到顶峰。宗教慈善在唐代始盛行,宋代因受到抑制有所回落,但明清后又持续发展。社会慈善在明清时才兴起,到民国时期便超越了官办和所有其



他各种慈善,成为社会救助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是鄞地自宋以来慈善人物大批涌现,善者辈出,代不乏人。他们中有官有绅、有商有民,有在本地行善者,也有旅外(经商)行善之士,当然也包括外籍涉鄞的或为官或经商之人。综计该书中所收录的各式慈善人物,古代(从北宋到清前期)149人(其中两宋26人、元代17人、明代60人、清前期46人);近现代(1840—1949)29人、当代(1949—2012)42人;又附从唐代以来至今的外籍涉鄞慈善人物35人;近现代鄞县义商11人、旅外鄞籍义商62人;当代鄞州区义商23人、旅外鄞籍义商29人。这些慈善人物既为鄞地慈善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树立了榜样和标杆,同时又引领和助推了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是鄞地慈善事业的类型不仅有“养”有“教”,而且注重与社会公益的发展相结合。在古代社会,对于弱势群的救助主要以“养”为主,包括救灾、恤贫、助丧、解困、养老、育婴、恤嫠、义冢、施衣、施医、施药、施棺、施粥、栖流等,总之是“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而且同时兼顾了若干社会公益,诸如修桥、铺路、筑堤、浚河、造亭、义渡、义学等。到了近现代,慈善救助便由重“养”轻“教”发展到“教养并重”和以“教”为主导,同时对于社会公益的理念也有了提升,即注重了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环境、革除社会陋习、维护公共事物,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五是鄞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注重慈善制度文化的建设。古代鄞地的官办慈善到南宋时即有建儒学以招难童、建药局以惠民众、创田庐以养穷困、建官庄以济士民等举措(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民办慈善包括宗族慈善、社会慈善、宗教慈善,从古代到近现代以及当代,都有着各自的规制与创造。如南宋的乡曲义庄,成为鄞地后世家家族、社会互助组织的典范。近代鄞奉公益医院和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创办,采行的都是董事会制运营模式。著名的鄞人沈敦和旅居沪上,担任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上海总办事处主任,执掌中国红十字会会务,改董事会制为议会制,竟然创立了三权分立的慈善组织运行机制,其管理体制与运营模式,令近代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面目全新,充满了活力与生机(见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

六是鄞地慈善文化传统的传承历久常新,促使当地慈风善俗习尚的养成,产生了表率全国的示范作用和影响。鄞邑向有“义乡”、“义郡”之誉,这里“义风”高扬,慈行善举无时不行、无处不在,相沿成习,蔚成风尚。各种慈风善俗,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节令、生产、公益、救助、信仰等活动中每有体现,并且行善者多不留名,非常低调。

我早在2006年出版《中国慈善简史》的时候,便深感全国各地纂修地方慈善史志的重要;如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这种感觉尤为深切。



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地方慈善史志的纂修,没有既有的地方慈善史志成果为基础,《中国慈善通史》的撰写难度无疑会增大,顺利完成任务也就会打折扣。反之,如果有了像《鄞州慈善志》这样的全国各地区县一级的慈善志书成果,情形便会大不同了。

其实今天我们对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认知以及我们现有的一些慈善研究成果,也是得益于前人纂修的地方志书中的慈善内容。例如我国港台学者梁其姿所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日本学者夫马进所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都是充分利用地方志书所载慈善资料研究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典范。这表明,旧方志中有关慈善的载录,所提供的学术信息或史料价值是非常大的。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今人在慈善志书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比较前人来说还有逊色和滞后。所谓盛世修史修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全国各地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方兴未艾,成果众多,然而像《鄞州慈善志》这样的专门慈善志书成果,尚属凤毛麟角。

在我的印象中,全国地方区县一级出版了慈善史志成果的,就是宁波市鄞州区,即2013年10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鄞县慈善史》和这本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的《鄞州慈善志》,而且记事时间都是从古至今,内容涵盖广泛,属于通史和通志一类。因此鄞州的慈善史志纂修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年来,在全国区县一级中无疑具有“三率先”的意义:一、率先纂修了慈善史和慈善志;二、率先纂修了慈善通史和慈善通志;三、率先将这一史一志都交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由此,鄞州在全国地方区县一级单位慈善史志纂修工作中的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并且,《鄞州慈善志》在编纂体例上的诸多立意追求也属可圈可点。

一是努力凸显鄞地慈善的个性化特质。即通过设立“地理”专章,注重了鄞地慈善事业产生、发展和特色形成的人文地理因素;通过设立“义商”专章,彰显了近代以来鄞地商帮因三次慈善事业高峰而表现出来的慈善主体特色;通过设立“风俗”专章,描摹出鄞地民间慈善公益的乡风民俗和长盛不衰、影响深远的“义田”制度与“善堂善会”传统;通过设立“机构”、“项目”、“规章”等专章,展现出鄞州当代慈善创新型和开放性、制度性的特点。

二是将慈善与公益广泛兼容。即在记载当代鄞州(鄞县)慈善组织机构、慈善人物及其事迹,介绍慈善项目和风俗时,力图充分体现当今社会“慈心善助”的公益化趋势,即不仅记叙慈善家捐赠(献)和救助的传统善举,还包括了广义的慈善指向,如对濒危珍稀动植物、饱受污染的环境和需要大力支持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事业,直接或间接地,长期义务开展帮助、保护和志愿服务的组织、人物及其事迹。

三是理解把握慈善专志“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强调不以“资治”为要,而应以“教化”为首。故该志不吝笔墨,尽可能对一些慈善人物和慈善项目作较多的叙

述和铺陈,或附文记录,以期达到教化之目的。

上述这些编纂体例上的追求,均富有创新性,值得赞誉和肯定。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曾应一家出版社社长之约,为其计划出版一套地方慈善志丛书,组织动员各地史志工作者和高校科研院所人士参与纂修慈善志书,写有三个方面的说辞,对于当今有兴趣研究和撰写地方慈善志书的人,我觉得或许可供参考,爰胪陈如次,为刍尧献:

一、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悠久的渊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人们对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了解与认识,在唐宋之前,主要依靠历朝编纂的正史;在宋元以后,则主要源于官修志书与个人私纂志书。自宋代到民国纂修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志书记载了当时慈善救济机构的有关情况。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庐院》,就详细载录了南宋建康(今南京)慈幼庄的创建情形及收养孤儿弃婴的运作管理规程;《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也有元代镇江府及各属县仓储、惠民药局的记载。至明、清两代,随着养济院、育婴堂等官办慈善机构的推广,以及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地方志中有关慈善机构(时称“善堂”、“善会”)的载录更多,常见于志书中的“建置”、“公署”、“恤政”、“蠲恤”、“善举”、“厂局”等名目。此外,在志书中的“人物”、“艺文”、“金石”、“碑碣”、“赋税”、“食货”等目,也可见慈人善士(慈善人物)、慈善组织的碑记、田地亩数、捐赠款额的记述。当然,这些志书中有关慈善的记载,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不同地方的方志的记载,所列名称也迥异。及至清末民国,随着“慈善”一词的广泛传播及其运用(晚清光绪之前,“慈善”一词的含义与今不尽相同,多指慈祥 and 善),新修的地方志也开始以“慈善”为标题专列一卷、门或目,专门记叙近代以来本地地区的慈善事业、慈善机构、慈善人物等。如黑龙江的《民国呼兰县志》(卷六《慈善志》)、《民国宾县志》(卷三《慈善略》)、《民国宝清县志》(卷十八《慈善志》)、辽宁的《民国新民县志》(卷十《慈善志》)、《民国铁岭县志》(卷十七《慈善》)、《民国开原县志》(卷九《慈善》)、《民国盖平县志》(卷十五《慈善》)、上海的《民国上海县志》(卷十《慈善》)、贵州的《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卷十七《慈善公益事业志》)、陕西的《民国重修紫阳县志》(卷二《建置志·慈善》);天津的《民国静海县志》则在《政事部·行政志》列有“慈善事业”一目。由于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兴盛,慈善事业入志十分普遍,在此不再一一枚举。以上所述充分表明,慈善入志,其实在我国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并不完全是新创,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慈善事业一度中辍,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一轮新修的方志中完全没有“慈善”的地位,相关论述多附于《民政志》中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或《卫生志》、《教育志》、《宗教志》里的一些条目,表述也极为简略,且多为否定、批判之辞,有的志书则完全缺载。进入新世纪,随着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展开,各地修志方兴未艾,亟须继承旧志修



志中的优良传统、好的做法,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与作用。

二、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瑰宝,也是极为丰富的资料宝库。志书编纂成后,无论在当世还是后世,都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用,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新时期编纂的地方志,无论是纂修方法还是取舍内容,都与民国及其前的旧志有着很大区别,但是,志书的价值古今大体一致。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故文献足征焉,劝戒不惑焉。”(嘉靖《九江府志》序)“夫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嘉庆《怀远县志》序)如今,经过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轮修志工作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对方志功用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深入,达成诸多共识,如:地方志所记一域之事,宜详悉,尤重当代,有裨实用,以备地方官员资政、了解民风民俗。近30年来,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从无到有,缓慢恢复到快速发展,虽然有诸多新闻媒体刊载报道,也编辑出版《慈善》、《公益时报》、《中国红十字会报》等专业杂志、报纸,也出版发行《中国慈善年鉴》(由中华慈善总会编辑)、《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但由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的周期性,对慈善机构、慈善人物、慈善事件等记载,都不够完整、全面,需要具有权威性的志书加以载录,叙述其始末因由、发展演变等情形。而新纂修慈善志书,若是一地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十分发达(如北京市、上海市),自宜单独成册,纂修专志;即便不足成册,也可单列成志,与其他类志书合册。近年来,苏州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合作出版的《苏州红十字会志》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和成功的尝试。盛世修志是我国千百年相承的文化传统,就当下而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由此,我认为,纂修慈善志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迫切需要各级地方志编纂部门支持与配合。这将有利于发挥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有利于发挥志书服务地方领导决策的作用,也为来者研究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料。

三、把握好《慈善志》的编纂体例及内容。按国务院2006年5月16日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当代慈善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已有30年的历史,已足以入志。在全国第一轮修志过程中,许多市、区(县)的地方志的下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大陆“重生”,特别是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后,各地纷纷成立慈善总会、慈善协会,慈善组织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据悉,全国各省、市、区(县)级慈善组织已逾2000家,还有不少慈善基金会、草根慈善组织。这表明,编纂《慈善志》已是条件具备,时机成熟。那么,《慈善志》的编纂,其体例应如何注意?其内容应如何取舍?或是说,慈善志内容应涉及哪些方面(篇目)?



(一)《慈善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方志是地方史料的集合体,各种史料如何排列组合,体例设计非常关键。《慈善志》的编纂,应该充分借鉴旧方志关于慈善载录的一些有益做法,如“人物志”、“列传”等门类对慈善人物(善人善士)的记载,“建置”、“公署”、“善举”或“慈善”等门类对慈善组织的记叙。在类目设置和编纂方法上,应当继承这些传统,同时又要根据变化了的地情、时代,有所创新,增添一些新门类,记载一些新事物,以反映当代慈善事业发展进程。在反映时代特色的同时,《慈善志》也应力求凸显地方特色,对当代特有或独特的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可不厌其烦。对篇目结构和体例要予以说明,一般从现代慈善事业产生、发展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结构分编、类、目三层,可设卷首、卷末和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捐赠、慈善活动、慈善制度(或法规政策)、大事记等。总之,类目要全面,分类要合理;类目要体现统属关系,归属得当,排列要有规律;类目的层次和篇幅适当平衡。此外,标题拟定也必须规范,要使用具有时代性的语言,通俗易懂,不能沿用旧志标题。标题对内容的概括应该准确,言简意赅,名副其实。

(二)《慈善志》的内容。卷首,可简要叙述本区域内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慈善组织,主要分述本区域内各慈善组织(含基金会)的创建、发展与消亡等情形。可分组织架构与领导机构、分会或基层组织、章程或规章制度、会议、慈善项目等。慈善人物,主要记述本区域内有影响的慈善人物(慈善家)的生平及其主要善行义举,以及社会影响。慈善捐赠,主要载录本区域内民众各年度的捐赠数额、慈善组织的劝募数额等。慈善活动,主要叙述本区域内发生的重大灾害赈济、日常慈善救济或比较有影响的慈善事件、公益活动等。慈善制度,主要记述本区域内为促进或规范当地慈善事业发展而出台、颁行的慈善法令、法规及其他政策、制度等。慈善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形式陈述本区域内发生的有重要影响的一些慈善事业大事。

2014年3月7日初稿

2014年4月30日补充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
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以善治促慈善

王振耀

宁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发起兴修《鄞州慈善志》，我认为是中国慈善界的一件大事。据我目前掌握的资料，这可能是国内第一部慈善专志。

兴修慈善志，就是为善者存史，是尊重慈善者的一种重要方式。让历史记忆善者，进而改进善治与善制，就会使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得到传统的支撑，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使自身得到快速的成长。

2011年，郭美美事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所牵扯的是社会对公募基金的信任危机，由此引发公众与传媒对于慈善问题的广泛讨论。网络媒体的唇枪舌剑，社会舆论的褒贬论争，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说，既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慈善事业要直面挑战，把握机遇，就需要经历一场更为深入持久的革新：我们应该推动建构一种全新的“治理结构”，促进中国慈善制度的现代转型。一言以蔽之，即“以善治促慈善”。

我从民政部辞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后，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2012年又更名为中国公益研究院），从完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角度，继续推进中国慈善治理模式转型，目标是以“以善治促慈善发展，以慈善促社会善治”。在社会领域，人们从传统意义上的“管”转向日益重视“治”的内涵和方式，其区分的关键近于大禹治水之“疏”与鲧治水之“堵”之间的区别。“疏”的要点是“治水须顺水性”，慈善事业的“治”也是如此，要迎合国际慈善事业发展的潮流趋势，顺应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境，契合慈善事业发展的科学规律，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战略高度进行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治理”。当前，“善治促慈善”的重点是推进两项创新：以知识创新为先导的慈善启蒙（观念创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机制重构（行动创新）。

治理行动的创新，其基本的依托是知识创新。当前国内慈善事业发展的形态虽有较大的改观，但仍是粗放阶段，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对于慈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前的关注很大层面上停留在社会舆论，更多的只是态度的呈现、情绪的宣泄、意见的表达。舆论虽然表达了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事件的整体共识，但仅是一种表层的社会知觉，并不足以代表理性的维度。因此，在社会舆论基础上，应



该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性、机制性、应用性的学术研究,形成慈善事业发展的整体性、框架性、对策性的系统知识结构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基点是有关慈善伦理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慈善,更加强调其动机与行为的纯正性,对商业色彩、倡导色彩浓厚的现代慈善带着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更倾向从道德层面评价行善者的动机,往往缺乏对慈善行为的“包容”。我认为,现代慈善应该更多地关注慈善行为对于目标群体所带来的福利改善,而不宜过度纠结“行善”者本身的价值取向,更不应过多地揣度行善者的动机等似是而非的东西。这种包容的理念或许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但从现代慈善的发展视角上来审视,这种“道德中性”的慈善观更有利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国际慈善经验的事实支撑。

对于公共领域的慈善,我们要求加强对其监督与管理,而对于企业家、明星等私人的慈善,社会则要为其提供更为宽容的舆论环境。当然,这并非漠视价值关怀,而是从另外的维度上来营造核心价值观,进而提升慈善者的行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而不仅是慈善事业本身。知识创新过程需要现代慈善的启蒙,是要将理性思维的知识传布于整个社会,让社会接受一种新知识生产方式的洗礼,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氛围。不仅仅是社会大众,现代慈善启蒙的对象还包括慈善事业的慈善捐助者、政府官员及社会工作者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曾经长期处于贫困,形成了一整套的“贫困道理”,已弥漫于全社会;在社会进入中等发达水平以后,这些“贫困道理”已经严重不适应了。因此,现代启蒙是善治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以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为导向,则要进一步拓展制度创新的视角与方式。知识创新所建构的是关于运行规律的学理体系,制度创新所建构的是关于运行机制的实践体系。后者又以前者为参照。慈善事业的治理创新,从当前来说,应该要从“行政创新”向“社会创新”转变,这也是我们从社会政策视角切入对慈善治理研究的重要逻辑。启蒙是一场重要的观念洗礼,这种观念付诸实施,则需要以制度创新作保障。社会创新需要激活社会中间组织与力量的参与活力,但目前在国内,“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受限于法律体系及行政机制而难有作为空间,或附着于行政体系而活性不足。当前非公募性的专项基金(多以冠名基金的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进非公募基金的健康成长,则又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内容。法律是规范社会关系的基础,对于慈善事业而言,建立完善一个核心的、与时俱进的、系统的法律架构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在法律框架下,评估、梳理、废弃、创新各个层面的行政性工作制度和政策,在法律与政策双重效应之下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制度体系。在制度架构下,完善慈善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监管体系,培育慈善基金管理人才与社会工作者队伍,扩大社会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的慈善参与,使之与政府和准政府慈善组织之



间进行平等合作与友好竞争,重构一个既规范又充满活力的慈善事业运行机制。

近年来,在慈善工作中,我接触基层的慈善不算少,但当我阅读由宁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发起编著的《鄞州慈善志》书稿时,依然带给我许多意外的惊喜——这是我目前所看到的第一部内容翔实、体裁首创的综合性地方慈善志书。该书让我看到了几千年来扎根在民间,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人们的生活交融的慈善事业,这也正是慈善的根,体现出我国慈善文化和慈善行为的深厚基础。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脱离了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就会常常找不到方向。同时,基层政府如此积极地推进慈善事业,基层的民众如此积极地参与慈善活动,从而使基层慈善组织充满了活力。鄞州区近些年推出的面向不同目标群体的社会慈善服务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福利。从学者的视角来聚焦,鄞州区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基层慈善的样本,使我们的研究有更多的地方实践范例支撑。本书对区域内古代及近代的慈善观念、组织和行为的演变进行梳理,拓展了我们在中国情境中思考我国慈善现代性问题的视角。鄞州区的慈善工作者和当地的专家学者,为我们,也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深入挖掘慈善文化价值的样本。

从当前国家层面的行政架构来看,县(市、区)级层面是行政的第一线,有较大的地方自主权,县域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有着极大的空间。从书中的内容看,当代鄞州区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行政创新为主要动力的,而社会民众层面、第三部门层面的慈善活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激发。因此,从“社会创新”与“以善治促慈善”的理念与构建相应机制的框架视角分析,鄞州区的慈善事业在引领全国县域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政府层面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借鉴国际经验,明确自身定位,创新工作机制与工作方法,导入更多的资源来推进非政府、非盈利部门的参与,使慈善事业成为区域内提供社会服务、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

宁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的同志嘱我为本书作序,兹将个人对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思考陈于书前,以为慈善的研究者及实务工作者们抛砖引玉。是为序。

2013年12月11日

(作者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序三：维慈与善 维桑与梓

朱禹宝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主持鄞州区慈善总会工作已近十年。这几年是鄞州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各项社会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很有幸地见证和参与了鄞州慈善事业在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同步迅猛发展的历程。

今日鄞州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深深得益于区域优良的慈善传统文化。四明(主体是今鄞州区)在南宋即有“义郡”之称,当时鄞地抚恤鳏寡孤独、兴办教育、赈灾济难等各类公益组织机构已经相当发达。元明清延续此风。到了近代宁波开埠之后,慈善事业伴随着商贸开放与经济复苏而应运复兴,传统慈善形式得以拓展。除义学、义庄等外,具备现代形态的慈善医院、慈善学校等也相继出现。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慈善文化——“维慈与善、维桑与梓”。“维慈与善”的慈善文化,发端于传统儒学中的“仁义”、“恻隐”之说,以奉行“慈心”、“善行”作为人生价值和道德关怀的体现与慰藉。南宋政治家史浩在《童仆须知》中劝诫子弟要恪守“孟公仁义说,不取利吾身”、“人生贵疏财”、“指廩闵人群”,即体现这种儒学慈心善行的文化传统。“维桑与梓”的慈善文化,则与鄞州域内支系盘根错节的宗族体系及旅居域外的鄞籍商帮息息相关。血亲宗族的聚居与繁衍,潜移默化地向其成员强化对乡里的责任意识与道德荣誉,又结合儒家“幼吾幼、老吾老”“天下大同”思想的灌输,使其成员自觉从事服务乡里的慈善活动。域外的商帮,创业艰辛,又备受旅居漂泊之苦,其寄情桑梓的表达也往往体现在“落叶归根”与“造福乡里”上。

“维慈与善”的道德关怀,与“维桑与梓”的责任意识,是鄞州慈善文化的核心精髓。改革开放之初的“商帮慈善”,及本世纪之初滥觞的“公民慈善”,无不是“维慈与善、维桑与梓”精神的具体体现。今日慈善既是对过往的继承,也是一种全新的拓展。现今,鄞州慈善已经形成了“党政推动、总会总揽,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立体式格局,慈善资源全面整合,众多企业和社会各个阶层踊跃捐款捐物,积极参与志愿义工活动,并呈现了平民逐渐广泛参与的特征。可以说,当前是我区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我们还要从三个方面不断开拓创新,继续推动鄞州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慈善不是单纯的



捐钱捐物,而是综合体现慈心善行、造福乡里的奉献精神。推进慈善事业,更要推进鄞州“维慈与善、维桑与梓”的慈善文化与慈善精神,使慈善文化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要工作。二是促进慈善事业与区域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相结合。慈善事业的帮扶对象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慈善事业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益补充。从人的发展需要出发,关注弱势群体,聚焦目标群体,提高其生活质量,是后续慈善工作必须坚持跟进的重点。三是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相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是协同治理,社会参与度是重要的标志。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要在党政有为的基础上,拓展思路、拓展形式、拓展渠道,建立健全各类体制机制,深化慈善事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

追昔抚今,继往开来,是我们鄞州区慈善总会倡议并组织编写《鄞州慈善志》的初衷。本志将鄞州古今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文化等有机梳理,系统整合,将鄞州深厚的慈善文化底蕴展示出来,勉励人们自觉地发扬光大,并融入慈善事业之中。此外,也希冀能对当前鄞州慈善事业的发展经验、现状及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寻求进一步的创新与拓展。

展阅初稿,欣喜万分。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的区域慈善专志,其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不言而喻。编写组同志们几易寒暑捧出的这一成果,又一次很好地诠释了“求实、敢为、争先”的鄞州精神。我谨代表区慈善总会及其他慈善组织机构,衷心感谢全体编写组的同志和协编的部门单位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

是为序。

2013年9月11日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第十三届政协主席,现任鄞州区慈善总会会长)



前 言

我国慈善之风古今炽烈,但据考稽似无慈善专志。各地历代方志仅有个别专卷记述慈善,如上海《川沙县志》卷十一《慈善志》(民国25年铅印本),慈善人事多散见于家谱、文集和报刊等。当代相关的慈善事项,则见于地方志书各个部门的工作,且多语焉不详,而各地编就的当今慈善(总)会志,如《泰安慈善志略》(2009年)之类也不多见。究其原因,一是各地古今慈善史料,浩繁芜杂,需要检阅大量的文献和前人的学术成果,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二是域内外不少民间慈善组织和个人的慈善善举,往往低调,不事张扬,缺少翔实记录,新闻报道则缺乏档案资料的佐证,慈善大家的善行往往涉及国内外,动态发生着,且难以联系,故慈善人物及其事迹的材料收集难度增大,容易挂一漏万,不易准确把握;三是当代区域慈善工作涉及部门多,志书编修的牵头和组织要有极强的统摄力,使各方通力协作,热心提供资料,才能成就其事;四是慈善与公益交融发展,大多不能截然区分,尤其是当今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和运作方式层出不穷,类型各异,如何合理把握区分,缺乏学理依据;五是地方综合性慈善专志的编纂,还是一项探索性工作,没有现成可资借鉴的成果,志书的内容、结构和体例,入志的标准尺度等难以拿捏。因此,克服困难,积极摸索,编纂出一部地方慈善综合专志,尤显价值和意义。

我国当代慈善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复兴中的慈善事业,对照现代慈善的内涵、外延和许多理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党政主导的特征还比较明显,民间和社会还未真正形成主体力量,鄞州也不例外;捐献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伦理性、捐赠救助者的主观动机和行为方式争议较大;慈善伦理则从重地缘、血缘、业缘等熟人社会的救助向兼重陌生人社会的扶助乃至人类社会的福祉的创造发展;行善方式和途径由实体为主向实体与虚拟并进。本书的编写,力求按照现代慈善理念予以取舍,力图客观实录这种转型期的特点和变化,传播这些理念。也基于此,本志记录的鄞地慈善人事由古及今,原计划截至2010年,鉴于中共中央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以来,鄞地慈善类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以鄞州区居民广泛捐助汶川大地震灾区为节点,鄞州银行慈善(公益)基金会建立为标志,鄞州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和志



愿者队伍精彩纷呈,部分在宁波乃至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呈现出向现代慈善事业转型的趋势,故延伸至2012年。同时,网络平台正成为现代慈善的主要载体之一,互联网时代鄞州慈善主体和运行机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本书试图记录现代慈善技术创新的新趋势。

一个地方的慈善由于人文地理因素和条件的差异,有着自身的风貌和特质,本书努力凸显鄞地慈善的个性化特质。一是交代鄞地慈善事业产生、发展和特色形成的人文地理的基础背景和史略,故设慈善“地理”和“史略”专章。这对于了解鄞地慈善历史和现状,不断继承和发展,研究探索当今慈善项目策略和工作机制创新,显然也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彰显鄞地慈善主体的特色。鄞地商帮近代以来有过三次慈善事业高峰:晚清以来至民国时期鄞籍义商全面回馈家乡,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宁波帮”工商人士有力支持故乡的教育、卫生、道路交通等社会事业;20世纪末鄞县慈善总会成立以来,引领当地企业广泛参与慈善事业,所以特设“义商”一章。三是慈善已经成为古今鄞地的民俗。全民的广泛参与度,也是国内外衡量一个国家慈善指数高低的通则,为此,根据媒体事迹报道,本志注重收录平民慈善家(人物)事迹,并列“风俗”一章,以期描摹出鄞地民间慈善公益的乡风民俗,并着重介绍鄞地长盛不衰、影响深远的“义田”制度和“善堂善会”传统。四是以慈善“项目”一章,竭力展现鄞州当代慈善创新型和开放性的特点。鄞州地处沿海开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众多,已与原住民数量相等,他们的慈善事迹屡见不鲜;由宁波诺丁汉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万里学院等7所高校组成的宁波南部大学园区和浙江省内建筑面积最大的宁波南部商务区,聚集了10万多名大学师生(包括外籍师生)和商贸白领,他们的热情参与,使得鄞州的慈善事业更富创新、更有活力。而鄞州引进的外资、外地企业和外来人才的慈善捐助,鄞州慈善机构、企业和走出去的鄞人、鄞企对域外的扶助,反映了鄞州慈善的开放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迅猛发展,积德行善的个体、组织化的机构和开放互动的网络这三股力量已经使慈善与公益广泛兼容,并且使得当代慈善的目标、对象指向和方式、方法开始进入全面创新的时代,慈善的内涵和外延随之提升且不断丰富扩张。这种趋势在鄞州区表现尤其显著,主要是因为鄞州地处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政府社会保障水平高、覆盖面广,渐臻完善,各慈善主体的捐赠项目、服务领域和施助客体,部分转向公益层面。所以本志在记载当代鄞州区(鄞县)慈善组织机构、慈善人物及其事迹,介绍慈善项目和风俗时,力图充分体现当今社会“慈心善助”的公益化趋势,即不仅记叙慈



善家捐赠(献)和救助的传统善举,还包括了广义的慈善指向,如对濒危珍稀动植物、饱受污染的环境和需要大力支持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事业,直接或间接地,长期义务开展帮助、保护和志愿服务的组织、人物及其事迹。这样的判别和选择,不会导致慈善的泛化,不必担心模糊慈善的特质,而是现代慈善时代性与创新性的强烈要求和客观表现。现代慈善必然认同和融合慈善行为的公益性,这将促使慈善社会与公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从而促进公民社会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

1986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上,大多数方志专家认同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而以“资治”为要。但慈善专志的价值功能恐怕以“教化”为首。慈善人物及其事迹的“教化”功能,除了名垂史志的褒扬和激励外,还需要生动形象的感染和熏陶。因此,一部慈善志书如果仅是大量的数据列举和事项罗列,不免干瘪而乏味,让读者看不到慈善人物的努力和感召力,而借助于一系列细节,就能客观反映慈善家丰满的形象以及义举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因而本志不吝笔墨,尽可能对一些慈善人物和慈善项目作较多的叙述和铺陈,或附文记录。

由于慈善事实的发生一般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对象指向不确定,且善举大小不同,持续时间有长短,所以除重大灾异救助有系统记录外,古今慈善文献、档案资料相对匮乏,人物、事迹及数据难以把握,而涉鄞现存700多种宗谱,我们还无条件尽行浏览,故对民间慈善人事和古今鄞境外,尤其是大陆境外的民间慈善组织和慈善家及其事迹,多有疏漏。有些介绍也只能借助网络搜索其事迹整理而成,其全面性、准确性有待斟酌。

作为国内第一部地方综合性慈善专志,其编纂虽屡易其稿,不胜艰难,然终得编成,则尽得当下宁波市鄞州区慈善事业的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以来,鄞地经济发展速度快,个私、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城乡居民收入明显增加,为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鄞州区慈善总会在历任会长的领导下,统揽全区慈善事业,工作卓有成效,公信力强。各慈善公益类群众团体、民间组织机构继承传统,不断涌现,民间积德行善之举蔚然成风。《鄞州慈善志》的编纂出版,集中展现了古今鄞地慈善事业的辉煌,也充分体现了鄞州区慈善总会的凝聚力,鄞州各区级部门、慈善公益组织机构对慈善工作的同心协力。鉴于鄞州区(鄞县)慈善活动源远流长,遗产丰富,高潮迭起,富有区域特色,中共鄞州区委党校委托宁波大学张如安和孙善根两位先生另行编写《鄞县慈善史》(古代和近现代)。鄞州慈善史、志两书的编辑出版,如卷轴纵横铺展,以便读者全景或立体地领略鄞地的慈善风貌。人心